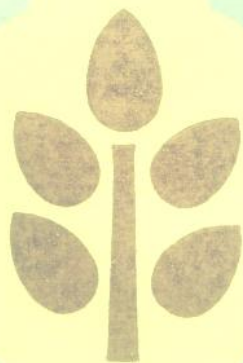


轉造未來
人們

泥土
著



鑄造未來人才
的
人們

泥
土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 侯春山

铸造未来人才的人们

泥 上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72,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2年 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107-10855-7

G·2437 定价5.25元

目 录

铸造未来人才的人们.....	1
----------------	---

第一辑

当代英模.....	35
化作春泥更护花.....	55
“愉快教育”的乐园.....	70
一座乡村教育宫的崛起.....	77
孕育新苗的沃土.....	85
中条山下春意浓.....	93
雷锋小学花儿红.....	100
向有理想的人寻找理想.....	108

第二辑

志当存高远.....	119
来自“一九〇”的报告.....	133
躬耕在学生的心田里.....	139
栋梁的立脚基础.....	148
重振龙门楼.....	157
金榜题名“六状元”.....	164

第三辑

四十年办学话北郭.....	175
旨在提高未来人才的素质.....	183

大连女子职高的女校长·····	191
从蒙妮坦到蒙妮莎·····	196
腾飞的龙城校办企业·····	204
中国一最——娃哈哈·····	216
摇钱树，哗啦啦的响·····	230

第四辑

秋 夜·····	247
一代脊梁·····	249
辉煌的讲台，辉煌的成果·····	260
问君哪得清如许·····	271
长河弄潮·····	286
追捕阳光的人·····	298
捷足者先登·····	305
创造人的巨匠·····	316
永恒的生命之光·····	326
走向心灵的大海·····	337
奴隶的花果·····	346
橱窗里的繁星·····	354
编后记·····	358

—— 铸造未来人才的人们 ——

——300 亿册教材编写者的甘苦与匠心

现代文明须从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哪些必备的精神养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

未来人才该怎样夯实赖以飞跃的智能基础？

这些关系到民族面貌、社稷兴衰、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谁在研究？谁能回答？

摩天大厦有它的设计师，万吨巨轮有它的铸造匠，未来的人才自然也有他的设计者与铸造者。赵朴初先生说得好：“教材的编写者是未来人才的设计者和铸造者”。

那么，编写教材的人们是怎样设计、铸造未来人才的呢？带着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笔者寻访了已达不惑之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供给学生最好的精神食粮——

一个字、一个标点也不放过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炎黄子孙结束了苦难深重的历史，奋然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愚昧与落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清

楚地意识到：兴国需要人才，育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材，教材要由专家来编写。

然而，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征战南北的万千精兵强将可召之即来，组建一支精粹的教材编写队伍却远非一朝一夕之功。1950年秋冬之交，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决定共同筹建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5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高瞻远瞩地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经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等四面招贤，八方选才，终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支由150多人组成的教材编写队伍，其中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不胜枚举。

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这位兼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语言学家，总是早上八点准时赶到社里。他带领社务委员会一班人，研究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种教材的成败得失，借鉴了国外多种版本的教科书，提出要博采古今中外教材之精华，自编全套中小学新教材。

教材覆盖面最广，使用率最高，一本教材，连结着千家万户，失之毫厘，便会谬之千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老社长深谙此理。编教材必须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课本入选的课文，文字要求必须十分严格。为此，有些课文的文字加工，花费了极大的功夫。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只说说编写中学语文课本时的一件事。

瞧，社长、总编辑叶圣陶召来了副社长、副总编辑

——著名散文家吴伯箫，编辑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著名文学史家张毕来，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王微，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蒋仲仁，崭露头角的年轻语文编辑刘国正，还有一位法文翻译以及一位很会讲普通话的同志。

少长咸集，阵容齐整，他们是要研究决策某方面的重大问题？

不，叶圣陶说：“请大家来集体编译一篇初中课文——《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选来的法国作家都德的代表作，有现成的中译本，还何必这样兴师动众？且听叶圣陶说：“捡到篮子里的不都是菜，何况我们编的是教材。这涉及到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下一代。”

叶圣陶便开始主持编译这篇课文。他说，原作文道都好，但没有一篇理想的中译本。我们的编译既要保持原作情节简单而生动，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水乳交融的艺术风格；又要表现出法国沦陷区人民热爱祖国、仇恨侵略者的思想感情。这一切，要运用规范、准确的汉语来表达。

叶圣陶先请法语翻译审阅原译文，看译得是否准确。然后，依靠集体的智慧，共同修改。

法文翻译译一句，大家议论一句。文学家谈此句该怎样说才形象、生动，教育家说此句怎么讲才符合作品中“我”（孩子）的心理，语言学家说此句怎样推敲才更加准确、洗炼，会讲普通话的同志说此句怎样才合乎普通话的

习惯。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叶圣陶先生再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定下这每句最佳的改译方案。

这样字斟句酌，逐句、逐行、逐段推敲、编译，从早到晚，孜孜不倦。《最后一课》全文不过 3000 多字，一代著名作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等聚集一起，连续工作了几天，才定下理想的译稿。这种不遗余力、精雕细刻、集思广益的编辑精神与作风，足可永载在中国编译史上。

千锤百炼的精品是有口皆碑的，这次改译出的《最后一课》，历经三四十个寒暑，至今还保留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全国多少代师生、亿万名读者，无不感到这篇课文从典型环境到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都译得精当、贴切、恰到好处。

当时的常务副社长戴伯韬说得好：“我们编辑的教材不能看作是某某个人的作品，而是培养下一代的工具，不能讲任何情面，不能有半点马虎。”语文编辑室拟将郭沫若的诗作《天上的市街》编选入中学教科书。此诗出自世界闻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之手，而且发表已有三十多年了，还需要编、审吗？人教社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家推敲了全文，感到诗文以奇妙的联想和想象编织出一幅天上的美景，把读者带进了神话的境界，能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益。不过，诗的题目要改，“市街”一词不规范，生活中听说过上“市街”去的吗？应改成《天上的街市》才好。出版社特致函郭沫若，说要改题，郭老欣然同意。从此《天上的市街》改成了《天上的街市》。

叶圣陶先生说，作文、改文要依靠口耳，读起来上口、

听起来顺耳。他写的一篇童话《蚕儿和蚂蚁》选为课文，有位同志对他说，根据普通话口语，“蚕”字是不“儿”化的，叶老觉得言之有理，即把“儿”字去掉了，改成《蚕和蚂蚁》。叶老给小学一年级课本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诗：“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谁会想到，在创作过程中，叶老为其中“闪闪的星星”与“蓝蓝的天”之间是否用一个顿号，不知推敲了多少遍，最后掂口耳的感觉，决定还是去掉顿号为好。

在叶老、伯韬、伯箫同志等老一代专家的带领下，人教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坚持了文道统一，坚持了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教学，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

叶圣陶正是这样，无论编审哪一科教材，哪一册课本，他都如切如磋，决不轻易放过一句话、一个字以至一个标点符号。这种极其严谨的编辑作风渗透到各科教材的编写中，影响着一代代编辑人员。文革期间，这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大本营自然被“革了命”。浩劫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继承了前辈开创的事业与精神，而且有所发展与创新。

在出版社从事了三四十年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工作的刘国正编审说，这十多年来，语文教材的建设，继承以往的优良传统，着重做了以下一些事：一、坚持文道统一的原则，既重视语文教育又重视思想教育；二、坚持授与学生基础知识，加强基本训练，努力做到读写听说四方面的训练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三、研究并努力建立语文教材的

合理体系。在1976年以后的几年里，主张在语文课的任务中取消思想教育的呼声很高，然而人教社语文室的同志没有动摇。刘国正于1983年1月发表了《语言·思想·知识》一文，指出应该取消的是那种极“左”的思想教育，至于合理的、恰当的思想教育，“不但不应抛弃，而且还应使它日趋完善，以求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语文二室对语文教材的编写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实验，编写了一套阅读和写作分编型的语文试验教材；近年来语文一、二室又编写了合编型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写体系都作了较大的革新。1987年12月，刘国正在香港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了大陆语文教材编写体系的改革，引起了同行们的兴趣。这项改革，在世界华文教材的编写中是居于前列的。

现在分管语文教材的副总编辑陈国雄还谈到，由毕生从事小学语文教材编辑工作的编审袁微子同他共同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全套教材，分低、中、高三个阶段：低年级从发展学生的语言入手，进行字词句的训练；中年级着重进行段的训练；高年级着重进行篇的训练。全套教材力求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和认识事物的规律，既注意纵向联系，又注意横向联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整体训练系列。

当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编写者们，正是这样努力奋进在继承、开拓、创新的大道上。

教科书要有权威性——必须做到 科学、准确、无懈可击

一位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过的教授说：“我这一辈子写过不少文章，著过不少书。我感到最难的要算是编写中学教科书。”

“是的，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不是私家著作，不是一家之言。”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了三四十年历史教材编写工作的苏寿桐编审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就涉及到不少自己难于决定的重大问题。”

苏寿桐谈到，比如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建国初期，中国几大史学家各持己见：有的说中国从西周开始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有的则说中国殷周时还处于奴隶社会；有的还持魏晋封建论，说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时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么办？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不能一一介绍诸家学术之争，也不能向学生传授模棱两可或模糊的概念，必须拿出一个确定的、带有权威性的意见。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通过教育部，向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了请示报告。

毛泽东主席经研究、斟酌，采纳了在甲骨文、金文方面造诣最深的史学家郭沫若的意见，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我们的教科书就以此为据。

从此，在大学、中学教科书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大体上都定在春秋战国之际，一直延用到今天。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编写历史教材过程中，还发生过不少。如怎样处理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怎么确定王朝体系和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都是经请示中央有关部门批复后才定下来的。

我们的各科教材，其基本的思想观点、涉及的方针政策，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有一点差错。六十年代初，国外有人指责我国，说中国历史课本中的一幅地图，把亚洲一些国家的疆域划进了它的版图。消息传来，中宣部派人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求尽速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负责历史编辑室的苏寿桐等，首先核查了本社编辑出版的教科书，没有发现问题。随即又去图书馆查阅有关书籍，发现有一本《中国近代简史》上的版图确有问题，但此书是私人著作，是由公私合营前的一家私营书店出版的。在短短两天内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声明：国家的历史课本上根本没有印制扩张版图的地图。想拿过去私商出版的著作来攻击我国是徒劳的。

然而，此事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教科书关系到国家的声誉，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做到科学、准确，无懈可击。编历史课本，既要尊重历史，忠于史实，又要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来分析、判断历史。

“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各科教材都被“革了命”。待到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全国上下，正本清源，百废俱兴。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要求教材做到

“按时”、“足量”供应学校，实现 1978 年秋开学前，“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一度被“四人帮”解散了的人教社重振旗鼓，再次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两百多名编写教材的专业人员，云集在北京西苑饭店，夜以继日编写教材。

当时春寒乍暖，不少历史的真相尚笼罩在云雾之中，困扰着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历史教材又碰到了不少是非被颠倒了的问题：如儒法斗争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统治阶级是否有调整统治政策问题、该怎么评价孔子问题，等等。对此，历史教材编写者一一作了分析、研究，对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通过教育部，报告了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诸位领导，不到一个星期即作了批复，同意报告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还作了重要批示，为编辑历史教材扫除了思想障碍，促使一套新的历史教科书如期送到了千千万万学生手中。

各科教材是塑造未来人才，完成国家教育、教学计划的基本工具；国家的教育思想及方针政策渗透在各科教材之中，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们为此而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现任分管历史教材的副总编辑、编审王宏志谈到，历史教材必须随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地改革。社会的进步扩大了史学的领域，历史教材反映的面，也应适当扩大。基于这种认识，教材的编写者从卷帙浩繁的史书中疏理了数千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科技、文学、艺术的历史，精心提炼出历史演变的主线，总体构思既注意脉络清

晰、主次分明，又力求丰富多彩、寓意深刻。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借鉴作用不容忽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编的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在讲到盛极一时的隋朝时，更换字体写道：隋文帝用饭穿衣都很简朴，他还教育儿子要节约。由于隋文帝的倡导，隋初形成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隋文帝在位 20 多年，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

后来的隋炀帝骄奢腐化，请各族首领来洛阳看百戏时，把城内外的树木都用丝帛缠绕，西域商人路过酒店饭馆，还邀请饱餐，不许收取分文。当时已是困难深重，民不聊生。隋炀帝的浮夸、荒淫，正是很快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生学了这堂课后说：“这是历史课，也是政治课，深刻、生动，值得借鉴。”

是的，今天新编的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十分注意用历史人物教育学生。“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史可法等等，都给学生形象生动的民族气节教育。讲到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壮烈殉国后，被解剖的胃中只有野草，没有其它任何食品时，多少学生眼圈红了。

讲到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多少代，多少人都没有寻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走出了一条光灿灿的社会主义大道。学生们认真深思起“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历史是最雄辩的教材，未来人才的设计者们正是这样给学生提供了多少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

科学与心血的结晶——深入浅出， 浅在其表，深在其内

中小学教材介绍的都是些基础知识，由此，有些人往往以为，编写这样的教材不需要多少高深的学问，用不着花很多的功夫。其实不然。从事了三十多年小学数学教材编写工作的编审曹飞羽说：“编写教材也是一项科学研究，而且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不下大功夫，不可能编出好教材。”

就说编写小学数学课本，除了要掌握国家有关的教育方针政策及教学大纲的要求外，还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学问：一是要有系统的数学知识；二是要懂得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学习数学的认知规律；三是要懂得教育学，能够运用现代教学论的原则和方法把前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使每个单元的教材的编排与儿童的认知特点相吻合。要做到这些，决非一日之功。

曹飞羽及与他共事三十多年的特约编审李润泉举例说，一年级课本中20以内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世界各国的教法不尽相同。概括起来说，进位加法，一般用的是凑十法；退位减法，则有三种办法：一是破十法，二是连

减法，三是用加来算减。我们该采用哪一种方法才科学合理呢？

为了探讨这个课题，我们认真翻阅了国内外的资料，总结了现行教材及过去几套教材的有关经验教训，重新编写了实验教材，先在个别学校进行实验，将实验班与使用通用教材的普通班进行对照比较，看哪种教材教法学生易于掌握，计算快速、准确。在初步取得效果后，再予以修改补充，进行第二轮实验。经过几次实验，他们才肯定了20以内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采取加减穿插的编排方式：先出9加几，随后出十几减9；再出8加几，随后出十几减8；……然后逐步对有联系的算式加以综合整理。计算时进位加法用凑十法，退位减法用加法逆向联想来算，并且适应儿童的认知特点在教材中加强了直观演示，增加了让学生操作的内容。这种编排方法，使新课的内容集中，思路单一，规律突出，儿童容易掌握；也利于儿童理解加、减法的内在联系，能促进智力的发展；还便于逐步简缩思维过程，提高计算速度。

请看，编写启蒙教育阶段的一个单元的数学教材，竟要作那么深入的研究，花多么大的力气，正如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复在本世纪初就曾指出的：“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

主管数学教材的副总编辑饶汉昌说：“我们非但要管编，还要研究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因为我们是为了教与学而编的。”他谈到，中小学数学课本的编辑们拿了自编的实验教材，深入到学校去，与教师一起备课，然后随